

从经济特区到自由贸易区

——论开放推动改革的第三次浪潮

李文溥 陈婷婷 李 昊

摘要: 开放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力量。以经济特区为代表的第一次对外开放浪潮推动中国走上了市场化之路; 以加入 WTO 为代表的第二次对外开放浪潮推动中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初步转轨; 以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第三次对外开放浪潮将推动中国越过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 建成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

关键词: 经济特区; WTO; 自由贸易区; 开放推动改革

中图分类号: F127.9;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569(2015)01-0019-09

DOI:10.13658/j.cnki.sar.2015.01.003

改革开放至今, 中国初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 对外开放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 新一次的对外开放浪潮仍将产生重大推动作用。

1976 年, 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长期的极左路线及十年内乱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 大部分人均收入及基本消费品拥有指标低于 1965 年甚至 1957 年水平。^① 恢复与发展经济, 改善人民生活, 实现国家富强, 成为社会共识。但是, 在长达两年多时间里, 一方面旧理论、制度仍束缚着人们头脑, 试图继续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大跃进的群众运动方式来促生产, “拨乱反正”、“把四人帮颠倒的是非再颠倒过来”等, 也即回到文革前旧体制的说法, 一度甚至成为主流。^② 另一方面, 部分研究从否定文革渐至质疑文革前经济模式, 开始了对旧的否定和对新的探索, 认为即使回到文革前的计划经济体制, 也难以解决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与资源利用效率问题。广大基层劳动群众对于旧体制, 尤其农民对于人民公社制度非常反感, 极力抵制。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编号: 14JJD790007)、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 13&ZD029)。

作者简介: 李文溥, 经济学博士, 厦门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陈婷婷,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李昊,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与此同时,结束了多年对外封闭之后,中国惊讶地发现,相比外部世界,中国的经济发展严重落后了。有关当局深切感受到对外开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1979年4月,广东省委向中央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等地划出一块地方实行特殊政策,单独管理,设立类似国外的出口加工区,初步命名为“贸易合作区”。1979年7月15日,中央正式批转广东、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决定“关于‘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1979年12月的第一次特区筹建专题汇报会议上,首次提出“经济特区”的概念。1980年3月,国务院采纳广东建议,正式将原拟的“出口特区”更名为“经济特区”。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批准公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事实上,早在中央和广东省酝酿、筹备把深圳、珠海建成外贸出口基地之时,交通部香港招商局与广东省就向中央提出在宝安县蛇口建立工业区。^③1979年1月,中央正式批准设立蛇口工业区。1980年8月批准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中国的经济特区自设立之初,就与国外的出口加工区有较大差异。原因在于:其他设立出口加工区的国家和地区,都是市场经济体,不少已加入关贸总协定,它们设立出口加工区,主要是利用境内关外的便利条件,开展加工贸易及转口贸易,区内区外都是市场经济,并无本质区别。而中国的经济特区却是计划经济中的一块体制飞地。尽管就其初衷而言,只是设想:1.在有限范围内实行对外开放,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2.引进国内短缺的资金,利用国内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加工出口,增加外汇收入。但是,要吸引FDI,发展加工贸易,经济特区就不能不借鉴国外,实行与当时国内不同的经济体制,以适应FDI企业的经营管理需要。特区设立之初即明确规定:特区经济以市场调节为主,实行适应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这就不可避免地当时全国范围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鲜明对照。由于条件限制,经济特区又不能像国外的出口加工区那样设在境内关外。境内关内,特区与普区、市场与计划,两种体制就近比较,相互交错,因此产生了设计者始料不及的效果:对外开放的飞地成为了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把中国引向了市场化改革之路。^④

特区设立以后,利用自身的区位优势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大力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大胆尝试与国际接轨、以市场为主的经济管理方式,有效地调动了发展经济的积极性。FDI不仅带来了国内短缺的资本,有效地利用闲置的土地和劳动力,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特区经济迅速取得了计划经济条件下难以想象的高速增长。1979—1984年,特区年均经济增速为23.17%,是同期全国平均增速的2.42倍。

经济特区以市场调节为主的社会经济管理方式,对外开放促成的观念更新、思想解放,尤其是所带来的高速增长,在实践检验真理的思想解放运动大背景下,对传统计划经济以及原有的正统价值观念形成巨大冲击。众多省市因此跃跃欲试,纷纷要求在当地设立经济特区。主张市场化改革的专家学者,在特区实践中找到了支持,但是,主张坚持计划经济为主的领导,却从特区发展中看出了潜在危险:市场竞争必然冲垮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企图刹车,提出特区不能再增加,经济发达地区不能办特区。广东、福建现有的特区关键是总结经验。要充分估计特区带来的副作用,要防止外国资本家与国内投机家因此出笼,大搞投机倒把等等,意在消除竞争,坚持计划经济。一些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则怀疑特区的方向、道路及性质。质疑“经济特区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认为特区有沦为租界的危险。一时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⑤

围绕经济特区的争论其实与当时正准备进行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连,争论的深层次背景是:中国究竟应当走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之路,还是继续实行闭关锁国的计划经济?

主张市场取向改革的有关中央领导及广东、福建的主要领导坚持前者,但不足以平息争论,扭转局势。直至1984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珠海和厦门特区,充分肯定特区三年多来的实践,方才扭转了特区逆水行舟的困难局面。邓小平不仅对“经济特区能不能办,该不该办”明确表态,而且指出:设立经济特区对于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领意义。特区应当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与经济改革的试验田,应当将特区实验成功的政策推广至其他地区,推动中国经济市场化。他指示“除现在的特区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特殊政策。还要开发海南岛。”1984年5月,中央进一步开放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在大多数沿海开放城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把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扩大了珠海、汕头经济特区的范围。1985年初,又决定把珠江、长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开发为沿海经济开发区。1987年4月,对海南建省办特区进行可行性论证,开始筹备把海南岛建设成全国最大的特区。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海南省,建立海南经济特区。至此,中国创办了五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开放了大多数沿海城市与地区,形成了一个由东向西梯度开放的改革开放格局。

1992年春天,邓小平再次视察南方,对十年来的争论做出总结“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邓小平的南方之行促使中国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目标。^⑥

1979年1月创办的经济特区,启动了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第一波对外开放,它所推动的城市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与发端于安徽凤阳的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一起,奠定了1992年春开始的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坚实基础。这是开放推动改革的第一次浪潮。

二

从办经济特区到1992年春确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对外开放引导中国经济改革走上了市场化之路。然而,开放推动改革的第一次浪潮所推动的市场化转轨似乎不是决策者以至于所有参与者一开始就目标明确的刻意行为,而是市场与计划两种体制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始于1995年的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WTO),就其初衷而言,更多是打开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的大门,引进外资,扩大出口,开始似乎也没有十分明确的经济体制改革用意。但是,它在扩大开放的同时,推动了市场化转轨的第二次浪潮,它用全国范围的制度化的对外开放实现了整个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初步转轨。

作为关贸总协定的创始缔约国之一,中国早在80年代就开始申请恢复中国的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⑦但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申请,直到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目标之后方才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加入WTO,意味着中国实行国际社会认可的市场经济制度,这就要求中国进行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然而,直至正式签署加入WTO协定之前,国内一些部门与学者对于加入WTO可能将给中国产业带来的冲击始终颇为担心。出于对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的考虑,保护民族工业、拒绝进一步开放、限制跨国公司投资之说一直是有市场的。加入WTO谈判,不仅对外谈判艰苦,而且国内始终存在各种阻力与反对之声。

经过十五年艰苦谈判,中国于2001年底加入WTO,它使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

段:从政策性开放转向了制度性开放,由此前有限范围有限领域的市场开放,转向全方位市场开放;由此前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与 WTO 成员之间的双向开放;由此前试点为主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在法律框架下的依法开放。入世 12 年来的实践证明,它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空间。2001 年至 2013 年,中国的 GDP 年均增速 10.09%,人均 GDP 增速 9.49%,人均 GDP 从 1042 美元提高到 6807 美元,在世界 200 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排名中从第 129 位上升至第 93 位,跨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组,进入了从中等偏上收入向发达经济过渡的新阶段。原本担忧加入 WTO 将危及其生存的民族工业不仅没有因加入 WTO 被打垮,相反,在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中日益强大起来,且不断发展。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相关数据的显示,2001 年,中国的货物出口占世界货物总出口的 4.30%,货物贸易顺差 225.45 亿美元。2013 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出口国,货物出口占世界货物总出口的 11.74%,货物贸易顺差上升至 2590.15 亿美元。中国成为了产量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加入 WTO,不仅使中国经济走出了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增长低谷,进入了本世纪头十年的高增长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入世十余年来,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竞争性领域基本上形成了非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多元经济结构(表 1),为市场经济奠定了坚实的产权制度基础。

表 1 2001 - 2013 年中国工业所有制结构

年份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总产值占比(%)	非国有企业总产值占比(%)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	非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就业占比(%)	非国有企业就业占比(%)
2001	44.4305	55.5695	-	-	44.8975	55.1025
2002	40.7839	59.2161	-	-	40.1566	59.8434
2003	37.5395	62.4605	-	-	36.5263	63.4764
2004	34.8147	65.1853	0.57755	0.42245	33.6438	66.3562
2005	33.2844	66.7156	0.515037	0.484963	30.0836	69.9164
2006	31.2425	68.7575	0.480075	0.519925	27.9936	72.0064
2007	29.5391	70.4609	0.44464	0.55536	26.1391	73.8609
2008	28.3674	71.6326	0.430271	0.569729	24.9995	75.0005
2009	26.7421	73.2579	0.446489	0.553511	23.2217	76.7783
2010	26.6051	73.3949	0.423276	0.576724	22.2238	77.7162
2011	26.1808	73.8192	0.356759	0.643241	20.109	79.891
2012	-	-	0.341392	0.658608	19.0664	80.9336
2013	-	-	0.330773	0.669227	14.6735	85.3265

资料来源:根据 CEIC 数据库数据计算

在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上,无论是全国还是东、中、西部地区,都有了很大提高。原先较为封闭、市场发育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 2009 年的市场化指数也已基本达到东部地区 2000 年的水平(表 2 图 1)。

表 2 中国区域市场化指数

	全 国	东 部	中 部	西 部	东北地区
2000	4.28	5.70	4.04	3.25	4.14
2001	4.64	6.67	4.08	3.29	4.40
2002	5.02	7.06	4.48	3.61	4.91
2003	5.50	7.53	5.08	4.08	5.25
2004	6.10	8.09	5.79	4.62	5.97
2005	6.12	7.98	6.19	4.57	6.02
2006	6.57	8.51	6.68	4.93	6.46
2007	6.92	8.94	6.96	5.25	6.76
2008	7.18	9.23	7.27	5.45	7.12
2009	7.34	9.56	7.45	5.42	7.32

资料来源:樊纲、王小鲁、朱恒鹏著《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 年度报告)》,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 年 12 月版;区域市场化指数采用作者计算全国市场化指数的方法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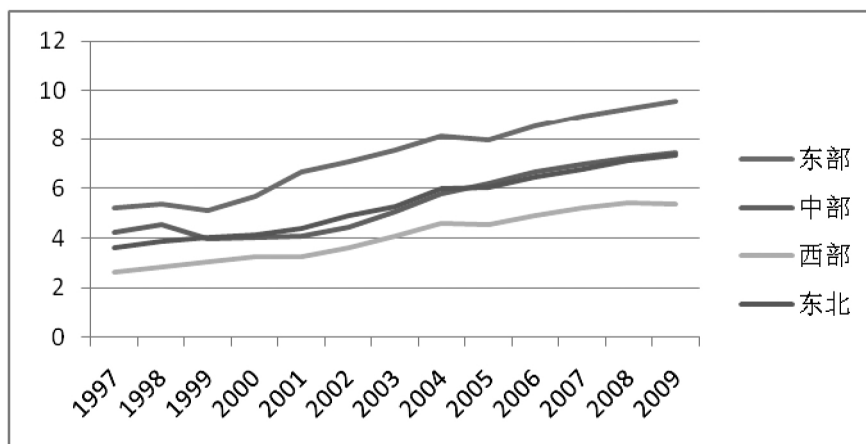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区域市场化指数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表 2 数据绘制。

三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加入 WTO 并非中国改革开放的终点。中国的经济体制市场化转轨虽然已经历时 36 年,但是至今仍未完成。《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虽然比计划经济前进了一大步,造就了巨大的经济成果,但其固有的体制弊病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日趋明显,政府主导型的“中国经济模式”难以实现从中等偏上收入向发达经济过渡的发展方式转型。“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进一步转向现代市场经济,其关键及基本难点在于政府如何自我限制其权力边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决定性作用。改革开放 36 年的历史经验证明,既得利益和体制惰性往往使体制内的自我改革受到重重阻力,难以成功。市场化改革如能

借助对外开放的外部冲击,将有力地克服体制内的阻力与惰性,推动改革加快步伐。因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外部世界是市场经济占统治地位,开放与改革是同向互补的。开放所引进的外部市场冲击,将比体制内的自主改革具有更强大、更持久的力量,它不存在内部自主改革进程中必然产生的改革疲劳症和懈怠,更能打破体制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改革阻力,更能克服社会既有思想意识、文化习俗所形成的价值否定与行为惰性,更能坚韧和持久地推进体制转轨。因为:

第一、对外开放提供了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所需要的制度性知识外溢。

第二、对外开放提供了强大而持久的外部竞争强制,迫使原有的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化。

第三、对外开放为改革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化转轨收益,为更快地向市场经济转轨提供了必要的资源支持。^⑧

1978年以来,兴办经济特区而掀起的第一次对外开放浪潮和加入WTO而掀起的第二次对外开放浪潮对中国经济市场化转轨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时至今日,当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之时,是否仍然需要开放助推改革一把,帮助改革顺利攻坚,尽快越过深水区?对外开放是否仍将像当年经济特区和加入WTO一样将对改革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次的对外开放浪潮将以何种形式出现,如何实现其作用呢?

四

在WTO框架下基本上完成了货物贸易自由化谈判之后,世界范围新一轮的贸易自由化随之就展开了。始于2001年11月的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的谈判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对立陷入僵局之后,为了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推进了“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多边谈判,旨在绕过WTO,推进新一轮的贸易自由化。

TPP与TTIP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综合性的、高标准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TPP谈判涉及的国际贸易新规则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涉及新议题和新水平。这主要包括:管制的一致性、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原则,以及在电子商务和中小企业等方面的新规则,其目的在于消除成员国国内监管制度的差异导致的“边境内贸易壁垒”(behind-the-border obstacles);一类则对现有深度一体化协定中已经涉及的内容提出了新的标准。这主要有知识产权保护、原产地规则、服务业开放领域的高标准、高标准的环境和劳工规则等等。^⑨TTIP的新规则一方面关注对美国和欧盟本身的经济关系非常重要的管制协调问题,^⑩另一方面关注在全球层面非常重要但不一定是欧美之间存在的问题,其他经济体进入欧美市场需要受这些新规则的约束。两大经济体希望通过制定相应标准,为全球贸易和投资活动确立标准。

TPP与TTIP就其思路而言基本一致:在WTO所达成的降低关税、货物贸易自由化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涉及国内政策的、要求更高市场开放度和规范性更高标准的国际贸易规则,以适应经济全球化下全球价值链生产为代表的新的国际贸易模式。

有论者认为“TTIP-TPP所制定的新贸易规则和市场准入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想将中国排斥在外,通过增加贸易和投资壁垒削弱我国竞争力,压缩我国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领域的战略空间……将极大削弱人民币参与国际结算的能力和潜在空间,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再添变数……通过知识产权、劳工原则、原产地原则等制度设计,降低并弱化由于经贸合作和技术扩散给我国带来的可能收益,为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进设置障碍。”主张另起炉灶,

争锋相对。^①

毫无疑问,TPP与TTIP是适应经济全球化下的全球价值链生产的要求,为推进涉及国内政策的、要求更高市场开放度和规范性更高标准的国际贸易规则而进行的努力。同时,发起者希望通过这两个协议成为新的国际贸易规则的主导者,也是不争的事实。当年在关贸总协定、WTO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规则制定中也是居主导地位的,这当然是由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整体实力所决定的,但不是中国拒绝的理由。TTIP-TPP包含了世界上大多数发达经济体,这些经济体的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60%,是中国主要的贸易对象国。中国作为开放经济,没有理由不与这些经济体往来。既然要与之往来,就不能不考虑TTIP-TPP将达成的新规则,择善趋利而从之;必要时,与之谈判,争取符合中国最大、长远、根本利益的制度安排。当年如此,现在如此,今后仍应如此。然而,更为关键的是必须认真思考TTIP-TPP所制定的新贸易规则与我国目前正要大力推进的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在方向上是否相容。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了我国在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阶段的主要改革目标、任务和主要措施。《决定》指出:

“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

“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严禁和惩处各类违法实行优惠政策行为,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

“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打破行政主导和部门分割,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

“放宽投资准入。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加快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

“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改革市场准入、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等管理体制,加快环境保护、投资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新议题谈判,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②

对照一下不难发现,《决定》关于深化经济改革与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基本思路、主要措施与当今世界范围正在酝酿形成的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在方向上是一致的,与TTIP-TPP并无本质矛盾。中国要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显然,在这个网络中不应当漏掉

TTIP-TPP。应用单国CGE模型的政策模拟分析表明:综合考虑增长、经贸、就业、产业发展等因素,中国加入TPP(P12+Q)、“中日韩-东盟”自贸区(10+3)、中日韩自贸区(CJK),经济影响都是正面的,P12+C在经济上的促进提升作用甚至要大于后两者。^③

自由贸易区是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所面临的新的对外开放机遇。实行管制一致性规则,有利于按照国际标准,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强制性地改造现存的不利于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作用的政府管理制度;实行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规则,有利于国家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实行高标准的环境和劳工规则,是促进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换代、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方式;实行服务业开放领域的高标准,有利于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将通过外部强制,使目前发展相对落后、发展潜力大、改革滞后、市场化水平较低的服务业尤其是自然垄断性行业扩大开放,引入竞争,推动改革。可以预见,接受国际贸易新规则体系,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有利于通过外部强制和国际竞争,克服体制内既得利益的阻扰和体制惰性,推动改革。

如何利用以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新的对外开放机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首先,应当处理好自由贸易实验园区与自由贸易区的关系。正如当年的经济特区,自由贸易实验园区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在全国范围全面实行自由贸易区政策的改革试验田。设立自由贸易实验园区的目的在于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而后向全国推广。因此,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不在于在全国设立多少个自由贸易实验园区,而是像邓小平同志那样,在看到了经济特区的改革实践证明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正确之后,马上将特区的成功实践转化为政策,向全国推广。应当尽快地在全国范围全面推广自由贸易实验园区的成功实践,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范围内形成体制统一、政策一致、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根据这一观点,我们认为,限于WTO的规定,现有的境内关外的自由贸易实验园区设置与当年不甚规范的境内关内的经济特区相比,显然更不利于体制改革的效应传递;仅限于自由贸易实验园区内的改革实验如不能尽快向园区外推广,其意义极为有限。因此,应当采取更为主动的改革精神,审视一下目前世界范围正在形成的自由贸易区规则,哪些是根本无须在境内关外的自由贸易实验园区实验,就可以在全国范围推行的?笔者以为,管制的一致性、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原则、知识产权保护、服务业开放、环境和劳工规则、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等,至少目前就可以在国内范围着手实施。其次,加入WTO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用外在的制度性强制实现国内经济的市场制度规范化,以破釜沉舟式的勇气,接受国际市场的竞争考验。实践证明,正是签署了入世议定书,接受了国际条约的法律约束,才由此大大推进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制度化进程;正是由于开放了市场,中国的制造业在激励的国际竞争中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在十年之间,产量及出口占比都跃居世界第一。

以经济特区为代表的第一次对外开放浪潮推动中国走上了市场化之路,以加入WTO为代表的第二次对外开放浪潮推动中国初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初步转轨,我们有理由期望,以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第三次对外开放浪潮将推动中国越过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建成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实现百年复兴的中国梦。也许需要的仅仅是当年一样的改革决心,破釜沉舟式的前进勇气,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的大无畏精神。

注释:

①参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04-139页。

②参阅《当代中国的计划工作》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③1978年5月,华国锋访朝回国途中,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向华提议,将大连建设成北方经济对外窗口,华随后很快批准派人到辽宁考察,但因条件不成熟而搁置。参阅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

④我国在深圳、厦门等地设立经济特区的初衷是利用这些地区与港澳侨台的历史联系,开展加工贸易,争取当时国家极为紧缺的外汇,并非有意识地通过办特区进行改革开放试点。特区要为改革开放进行政策试点的思路基本上是1984年邓小平视察四个特区后才形成的。

⑤参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061-1063页;胡少安《敬畏人民——项南传》(上),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79-380页;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上),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⑥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83页。

⑦1982年12月,外经贸部会同有关部门向国务院提出我国应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的席位,1983年1月,国务院回复同意。1986年7月10日,我国正式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申请。

⑧有关详细分析,请参阅李文溥、焦建华《从开放走向市场——沿海开放地区经济体制转轨的一个案例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⑨东艳《全球贸易规则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的机遇》,《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1期。

⑩双方监管方式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行政负担,已成为美欧贸易发展面临的障碍。研究表明,监管差异带来的额外成本相当于10%~20%的关税保护水平。由于非关税贸易壁垒,欧盟出口到美国的烟酒附加成本平均超过14%,美国出口到欧盟的烟酒要面对平均超过50%的附加成本。欧盟化工行业要承担相当于超过100%的附加关税,是在美国当地生产的3倍多。

⑪吴伟《美国推动“两洋经贸框架”的动向及对我国的挑战》,《中国财政》2013年13期。

⑫转载“中国已完成与东盟(亚细安)、新加坡、巴基斯坦、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新西兰、冰岛和瑞士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自贸谈判,正在谈判的还有中国与挪威、中日韩自贸区等六个自贸协定。此外,中国还在推进“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见2014年11月2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三大自贸区八天取得突破 中国对外自贸区战略明显提速》<http://www.zaobao.com/finance/china/story20141120-414113>

⑬吴润生、曲凤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趋势、影响及战略对策》,《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1期。

参考文献: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
《当代中国的计划工作》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大事辑要(1949-1985)》,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
胡少安《敬畏人民——项南传》(上),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
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著《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2011》,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李文溥、焦建华《从开放走向市场——沿海开放地区经济体制转轨的一个案例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4期。
石广生主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读本》(一、二、三、四),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2011年版)。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张小琳、姚新超《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争议与中国的发展趋势》,《国际经济合作》2013年第5期。
陆燕《美欧加速推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动因》,《国际贸易》2013年第7期。
吴伟《美国推动“两洋经贸框架”的动向及对我国的挑战》,《中国财政》2013年13期。
吴润生、曲凤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趋势、影响及战略对策》,《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1期。

ABSTRACTS OF MAIN ESSAYS

The Significance of Researches on Marx's Second "Philosophical Puzzle" ——How the "Rational Crux" of Hegel's Dialectics Is Stripped Out

Feng Jingyuan

Marx's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has undergone a difficult process in the course of its formation,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wo "philosophical puzzles". The first "philosophical puzzle" is a shift from Kant's and Fichte's philosophy to Hegel's philosophy which is achieved by self-criticism of Marx's philosophy. The second "philosophical puzzle" is a "rational crux" stripped out from Hegel's dialectics and added with law-transcending history during this process. What should be mentioned in particular is that to some people here it has become another puzzle from history to historical conception and then into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Regarding Marx's philosophy, only by combining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studies from science of law can we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rational crux" in dialectics.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needs "rational crux", which only in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can play the role of finding the historical truth. Hence, only by understanding the two "historical puzzles" can we understand the origin and application of "rational crux" in dialectics.

From Special Economic Zone to Free Trade Area ——On the Third Wave of Pushing Reform Forward

Li Wenpu/Chen Tingting/Li Hao

Opening-up is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the reform. The first wave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represented by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 promotes China to embark on the road of marketization. The second wave of opening up, represented by the accession to WTO, promotes China to achieve the initial transition from planned economy to market-oriented economy. The third wave of opening up, represented by Free Trade Area, will push China to cross the crucial period and the deep-water area of reform, to build a modern developed market-oriented economy.